

晋绥抗日根据地——

支撑敌后抗战的重要堡垒

■范晓峰 李梦蝶 周 一

抗战全面爆发后，八路军第120师按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在八路军总部的具体指挥下，南出晋中，北上大青山，东进冀中、平西和北岳恒山地区，开辟了广泛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至1938年12月，以晋西北和大青山为主要组成部分的晋绥抗日根据地，已拥有50余个县城，人口将近1000万人，成为我党我军在华北地区一块重要的战略基地。

从地理位置上看，晋绥地区位于黄河以东，与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隔河相望。自抗战全面爆发以来，侵华日军不止一次想要渡过黄河，攻击党和军队的重要领导中枢所在地，晋绥抗日根据地因此成为陕甘宁边区东侧的重要屏障。同时，晋绥以东地区广泛分布着党在敌后建立的众多抗日根据地，这一地区也成为沟通中央与地方的重要中转基地。虽然此时的晋绥抗日根据地已初具规模，但受敌情、地形、经济和友邻部队等各种主客观条件影响，斗争形势依然不容乐观。

侵华日军进占广州、武汉后，抗日战争逐渐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顽固派也改变了对共产党和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的态度，呈现出“反共反人民”的趋势。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虽公开表示要坚持抗战，但在具体会议中讨论的是如何对抗共党的问题，并制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其假抗日、真反共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处于晋绥一带的是国民党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他于同年3月在陕西宜川秋林镇召开晋绥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史称“秋林会议”，其主要目的是对辖区内共产党领导的各类武装进行改编，并做好“和日”的准备。

文武结合，坚决反顽

“秋林会议”后，阎锡山开始组织各种反共行动。首先，弱化党组织在部队中的作用。他将山西新军中由共产党员担任的主要领导调离岗位，委任其为国民政府高官，实质上是要这些部队脱离共产党的领导。随后，下令取消了决死第1至第4纵队的政治委员制度，并将每个纵队一分为二，由其晋绥军的顽固分子担任军事主官。其次，在经济上对八路军实施严密封锁。阎锡山将晋西北地区划为晋绥军的10个“师管区”之一，不准八路军在这里筹粮筹款，声称要“困死八路军，饿死八路军，赶走八路军”。最后，蓄意制造多起摩擦事件。在阎锡山的默许下，晋绥一带的顽固派向由共产党领导的党、政、军、民组织发起



1944年9月，八路军向汾阳城附近的日伪军发起进攻。资料照片

进攻。其中较为严重的是1939年12月发生的“晋西事变”，多个县的民主政府党员干部和八路军后方医院的伤病员遭到屠杀，遇难者达到200余人。

中共中央高度重视阎锡山的反动行为，并通过中共中央北方局、中共山西省委对晋绥抗日根据地的反顽斗争作出指示。经过研究，中央领导同志普遍认为，“投降是当前时局的最大危险，而反共与倒退则是准备投降的步骤”，为应对这种愈演愈烈的危险情况，必须从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全局着眼，既要坚决斗争，又要讲究策略。也配合中央决策，晋绥抗日根据地主要领导分别在《五日报》《新西北报》上发表文章，宣传党的政策、揭露顽固派的丑恶面目，号召广大抗日军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坚决同这种反动、顽固的行为作斗争，形成了一定的舆论氛围。

与此同时，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也开展了强有力的斗争行动。“晋西事变”后，为保护当地进步力量，第6区专员公署和决死第2纵队宣布成立“抗日拥阎讨逆总指挥部”，举行誓师大会，准备开始反击。自1939年12月10日起，该部队分两路，对盘踞在隰县、石楼、永和、大宁、蒲县等地的顽固派军队和部分日伪军开展进攻，不仅消灭敌有生力量，还向当地群众展示我军的军事实力和坚定抗战的决心。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领导部队始终把握好军事斗争的方法和力度，打出“坚持山西抗战”“坚持山西团结”等口号，有选择性地进攻敌顽武装势力，八路军部队则多在侧翼掩护，尽量减少与阎锡山晋绥军的正面冲突。随后，毛泽东、周恩来先后向阎锡山发出亲笔信，并由萧劲光、王若飞、王世英

等人与阎锡山面谈，“晋西事变”最终得到和平解决，晋绥地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得到维护。

分段实施，挤走日伪

1942年秋，由于侵华日军对晋绥抗日根据地不断进行“扫荡”“蚕食”，导致晋绥抗日根据地的面积、人口、物资等严重减少，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甚至也暂时撤退至晋西北的偏关一带。面对这样的形势，晋绥抗日根据地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着手开展“挤敌人”的斗争，努力扭转被动局面。

“挤敌人”的斗争在受敌人侵害最为严重的第8军分区重点展开。当时，盘踞在此的日伪军多达6000余人，而八路军只有2000余人，且武器装备水平与敌人相差较远。为减少损失，循序渐进，第8军分区党委按照3个步骤，分阶段实施“挤敌人”的斗争。第一阶段，展开“敌进我进”的行动，站稳脚跟。自1943年2月起，多支武工队渗透进入敌占区，择机对出动的日伪军进行伏击，使这一地区敌人的心理受到震慑，大多龟缩在据点里不敢外出。第二阶段，打破敌人“维持”，发动群众。失去日伪军的支持，多地反动“维持会”难以为继。已经深入各村的武工队立即着手逮捕死心投敌的“维持”分子，进行公审、严厉惩治，获得群众的广泛支持。第三阶段，迁走部分群众，坚壁清野。为进一步孤立敌人，部分县委在充分征求意见、尊重群众选择的前提下，组织群众



伟大胜利的战略基地

搬家到根据地。缺少筹粮基础的敌军只能从较远的城市运送补给，八路军部队顺势展开袭击敌人交通线的行动，使这一地区的日伪军补给更加困难。

大举反攻，收复失地

通过1年多“挤敌人”的斗争，晋绥抗日根据地共挤退敌人据点100余个，收复村庄2600余个，解放群众36万余人，取得扭转本地区抗战局势的巨大胜利。为进一步打击侵略者，扩大对敌斗争的战果，晋绥军区决心发起1944年秋季攻势，扩大根据地，并切断敌人的多条重要交通线。自8月28日起，各分区部队分别在忻县、五寨、静乐、汾阳等地攻击敌人据点。

1945年1月，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发出《关于1945年对敌斗争工作指示》，提出要进一步发动群众，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最大力量开展敌后之敌后的工作，为将来反攻创造有利条件。晋绥军区根据这一指示，决心发起1945年春季攻势，主要任务是夺取离石到岚县的公路，为开展更大规模的反攻创造条件。自2月17日起，我军先后解放岚县周边的下西山、西属巴、方山、赤坚岭等地，县城中的伪军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大部逃跑，岚县不攻自破。自3月中旬起，我军又先后收复多处据点，使第1、第2、第8分区连成一片，大幅扩大了根据地面积。

8月8日，苏联红军对日宣战。9日，毛泽东同志就苏联对日宣战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下，日本政府被迫发出乞降照会。8月10日和11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连续发布7道进军命令，其中第3道与第4道发给贺龙，分别部署了北进绥远、肃清山西境内伪军、统一部队指挥等工作。据此，晋绥军区成立了以贺龙、李井泉统一领导下的3个指挥部，北线以归绥为中心，南线以太原为中心，开展大规模的反攻作战。反攻部队所到之处，群众欢欣鼓舞，纷纷参军参战、支援前线。经过近1个月的作战，日伪军被压缩到数量有限的几座县城，败亡之势尽显。

在艰苦卓绝的抗战中，晋绥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民共同努力，在黄河东岸竖起一道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坚强屏障。同时，它与华北众多抗日根据地相互联系、相互策应，成为支撑敌后抗战的重要堡垒。

1943年5月，国民党军庞炳勋、孙殿英等部投敌后，即纠合豫北伪军杜淑等部组成伪第24集团军，下辖暂编第5、第6、第7军和独立第1、第2旅及太行保安队等部，分布在新乡至安阳间平汉铁路各要点及其两侧地区，配合日军进攻我抗日根据地。

7月10日，盘踞平汉铁路西的伪暂编第5、第7军和太行保安队共2万余人，在日军第35师团3个步兵大队配合下，侵占我太行区的林县城及其周围地区。为歼灭侵占该地区的伪军主力、重新开辟太南抗日根据地，第129师贯彻八路军总部的作战意图，决定以太行军区、冀南军区主力一部和冀中警备旅发起林南战役。

战前，在南起辉县西平罗、四寨，北至林县姚村这一区域内，日军和伪军总兵力达2万余人。虽然敌军兵力是我军3倍，但其部署较为分散，且伪军内部动荡不稳，与日军亦有矛盾。鉴于此，第129师决定以优势兵力分割包围，各个歼灭林县城及其周围据点的伪军主力，然后在有利条件下扩大战果，继续消灭林县以南各据点伪军。此次作战分为东西两集团，具体部署为：以第13、第771团全部和第1、第10、第34团、警备旅第2团各一部为东集团，向林县城北之姚村、城东之横水和城东南之东姚等地伪军进攻；以第769团（附山炮连）、第20团、警备旅第32团全部和第2、第3、第32团各一部为西集团，向林县城及其西南的合洞、原康等地伪军进攻。另以师部特务营一部、太行军区第5军分区义勇军结合地方武装，向水冶、观台之线积极活动，阻击由安阳可能出援之敌；以抗大第6分校组成的武装工作队，在东姚、临淇、原康地区积极开展游击战，牵制和袭扰敌人；以太岳军区部队向白晋路之敌出击，以策应主力部队作战。

8月18日0时30分，战役正式打响。我东集团避开敌前哨据点，以主力插入敌纵深，包围林县城东北的南北陵阳、东西夏城等伪军据点，以吸引林县城伪军的注意。西集团乘势集中主力向林县城及城西北外围据点发起进攻。至天明，伪军数次反扑均被我击退或歼灭，但仍凭借第24集团军前敌指挥部和保安司令部核心阵地顽抗。战至中午，林县城之伪军全部被歼，城内残留的头道营之日军据点被我包围。

当日夜，我军集中力量对头道营之日军据点展开进攻，敌人趁夜暗退往县城南关据点待援。19日，林县城

郊外围据点亦全部肃清。在西集团向敌发起进攻的同时，我东集团除准备阻击由安阳出援之敌外，先后攻占南北陵阳、东西夏城、姚村等据点。20日，我东西两集团乘胜南下，扩大战果。东集团收复东姚集，攻占李家厂，横扫鹤壁集、西鹿楼以西地区；西集团收复合洞、原康，进击临淇，攻克西平罗、南平罗。

24日，安阳出援的1000余名日军进抵林县，辉县出援的400余名日军到达临淇。26日，敌从林县、临淇出动进占原康，并西进至连家坡一带，在遭我西集团的迎头痛击后，于当晚渡河撤回林县。是时，秋雨连绵，山洪暴发，渡河日军被河水淹没冲走者达100余人，我军亦因渡河困难而停止追击。林南战役至此结束。

此役历时9天，共歼灭日伪军7000余人，攻克据点80余处，解放了林县以南、辉县以北拥有40余万人口的广大地区。战后，《新华日报》太行版在《评八路军豫北大捷》一文中，称“林南战役是太行山上3年来继百团大战之后最大的一役”。林南战役使林县南部、辉县北部的敌人遭到毁灭性打击，巩固了刚刚创建的林县、汤阴、汲县、淇县、辉县抗日根据地，为八路军继续向南发展打开了局面。

手写医书见证鱼水情深

■王希明 白莉娟

“家里有一本土布包裹起来的医书，是红军战士手写的，你要好好留着。”这句父亲临终前的叮嘱，让湖南省永州市蓝山县毛俊镇鹤峰村村民李永红始终铭记在心。

去年夏天，李永红将珍藏多年的医书捐赠给湖南革命军事馆。这本用黑色棉线装订而成的医书，共计158页，虽历经岁月沧桑，仍保存完好。泛黄的书页上，繁体竖排的毛笔字迹清晰可辨，工整地记载着伤寒、受暑、湿气、中风、风痛、咳嗽、气喘等30余种常见病症的治疗药方。这本倾注着红军战士心血的医书，揭开了红军长征经过蓝山的历史，见证了红军长征途中的军民鱼水情。

1934年至1935年红军长征期间，多支部队曾先后经过蓝山县。一路上，红军一方面要突破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另一方面还要保持高强度急行军。在极端恶劣的战斗环境下，红军伤病员数量急剧增加。当时，一位名叫“小于”（音）的红军战士因伤势过重无法继续随军行动。当地村民李范儒（李永红的曾祖父）冒着生命危险将其秘密收治在家中，用中草药帮其疗伤。李范儒出生于1897年，早年在云南游历期间曾于中药房学艺，回乡后以行医济世为业。他将小于藏匿于自

家阁楼中，用一堵假墙遮挡入口。大约一周后部队开拔，由于小于伤势未愈，带队干部决定让其继续留在李家接受治疗。

在治疗养伤期间，小于与李范儒结下深厚情谊。在一次长谈中，李范儒感慨自己文化程度有限，许多珍贵药方恐将失传。小于听闻，主动提出自己可以帮忙将药方记录下来，整理成册。就这样，在李家的阁楼上，展开了一场特殊的文化传承：李范儒逐一口述药方内容，小于则用毛笔认真记录。经过半个多月的努力，一本手写医书顺利完成。

在李范儒一家精心照料下，红军战士小于很快恢复了健康。这本医书原是小于是为感谢李家而协助整理的，临别时，小于坚持将完成的医书留给李范儒，希望这本凝结众多医疗经验的医书能为更多村民解除病痛。为把这本手写医书保护好，把这段红色精神传承好，李范儒及子孙都会将医书作为重要遗物交由后人妥善保管。

如今，这本红军战士手写医书被湖南革命军事馆收藏。李永红希望以这本医书为载体，讲述好红军时期军民鱼水情深的故事，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成为激励人们奋进的强大精神力量。



链接历史

晋绥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建立的重要根据地之一，为抗战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34号

邮政编码：100832

发行电话：(010)68525572

每周一、二、三、四、五出版

全年定价150元

零售每份0.57元

承印单位：解放军报社印刷厂（地址同社址）